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刘克明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刘 克 明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克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7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2507-4

I. 刘… II. 中… III. 苏联-研究-文集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403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98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31.50 元



作者像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编者的话

刘克明先生，1919年7月28日生于辽宁省昌图县。今年7月28日是他的80岁生日。为弘扬刘克明先生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为鼓励年轻的科研人员自觉地献身学术事业，为了贯彻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目标，东欧中亚研究所所务会决定，在刘克明先生80寿辰之际，出版他的文选。研究所还将举行庄重的仪式为他过80岁生日。

刘克明先生长期从事理论教学、工会工作、党的外事工作和学术研究活动，是一位著名的东欧中亚（苏联东欧）问题专家。他早年在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任马列主义、哲学理论课教员，解放后担任过地方领导工作，50年代以后从事党的对外联络事务，80年代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刘克明先生是我国东欧中亚（苏联东欧）学科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在的东欧中亚研究所）创办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他是中国苏联东欧学会（现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顾问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会顾问。他还任世界经济学会理事、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

刘克明先生具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功底，对世界经济进行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对东欧中亚（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思想文化诸方面有精深的造诣。他通过自学，掌握了英、俄和法语，都已用于工作。这与他勤于钻研是分不开的。他在不同工作岗位上能结合实际工作对国内和国际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探索。

80年代以后他的科研工作有了重要的拓展。这期间，他同金挥同志一起主编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该书是国家“六五”计划的重点社科项目，全书近60万字，是我国苏联问题学者对苏联问题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的力作。他还与吴仁彰研究员共同主编了《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一书，全面阐述了苏联70多年来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轨迹及其教训。他还在一系列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论文，如《苏联落后于时代的教训和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战后新时代和苏联由盛转衰的时代根源》、《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及前景》、《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浅析苏联霸权主义根源》等等。这一期间他多次做过学术报告。

刘克明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是苏联东欧问题，着重研究苏联政治经济情况、中苏关系、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苏联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及其历史经验等，中心是探讨苏联7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经验教训，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供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借鉴。

刘克明先生的最主要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是：

第一，探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他认为，苏联发生剧变，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总的原因来说，是传统

的社会主义模式长期不进行改革，日趋僵化，日益同战后新时代要求相背离的结果。这个新的时代论为解决战后各种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不注意研究战后新时代呈现出来的新特征，仍抱着陈旧的时代观不放，以至从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方面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甚至与新时代背道而驰，这是战后时期苏联陷于衰落和停滞的时代根源。为什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僵化的趋向在斯大林之后，经过几代领导人，还是得不到纠正？其根本原因在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已经形成一个拥有巨大权力而又不受监督的官僚特权阶层。

第二，探讨 60 年代大论战和探讨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直至破裂的原因和教训。作者对两国的这段历史颇为熟悉，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论的思索。这是作者学术的重点领域。

第三，80 年代初期，在探讨苏联社会制度演变和霸权主义根源时，作者提出苏联是一种变形的，即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从学术的角度论证了苏联不是社会帝国主义。

第四，对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改革和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评价，并对这一时期苏联改革的矛盾性作了深入剖析。刘克明先生充分肯定了赫鲁晓夫时期体制改革的创新意义和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作者分析了赫鲁晓夫改革中矛盾性产生的原因，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深入反思和改革斯大林模式。

第五，对苏联 70 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强调指出苏联改革的必然性、迫切性，以及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第六，苏联粗放经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早已不适应苏联社会发展的现实，势在必改。

第七，提出要认真研究苏联社会主义超越阶段的历史教训。为了有成效地进行体制改革，必须重新深入认识和思考传统的社

会主义理论概念。

刘克明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承认。他曾先后赴美国、日本、苏联、保加利亚等国参加学术活动，在1979年举行的中美学者讨论会上，刘克明先生《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学术论文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刘克明先生在我国东欧中亚（苏联东欧）学界很有影响，他经常接受邀请到各地讲学、参加学术讨论。他长期担任中联部苏联研究所和社科院苏东所所长职务，对推进我国的东欧中亚学（苏联东欧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苏联东欧学会成立后，他担任副会长，组织和协调全国的苏联东欧学的学术活动，并积极同国外同行加强联系。

刘克明先生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思想。苏联东欧学是比较特别的研究领域，它时常受到政治、国家关系等诸方面因素的制约，不论国际上和国家关系发生什么变化，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他始终坚持科研工作中的实事求是原则和对科学锐意探索的精神。刘克明先生在这方面积累了可贵的治学经验。刘克明先生治学勤奋严谨，为人正派耿直。他心无旁骛，埋头学问。

刘克明先生不仅埋头治学，还教书育人。他培养了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国家、为东欧中亚学界输送了有用的人才。

1999年5月31日

前 言

奉献读者面前的这部文集，是 1979～1999 年 20 年间，我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主要文章汇集。这些文章，大致反映了在这个时期我对苏联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

70～80 年代的几篇文章，主要是论述苏联对内对外理论和政策的文章。90 年代以来，在苏联发生剧变之后，则主要是反思、回顾、重新认识苏联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和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故而我的研究领域不能不随之而扩大。研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战后新时代问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直至破裂的原因和教训问题，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入探讨问题，而苏联剧变的原因和历史教训则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

这些文章按其内容，可粗略地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主要讨论战后新时代与社会主义问题。主要是讨论邓小平时代理论的重要意义，战后出现的新时代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以及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精神。

第一，这些文章指出，邓小平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战后时代理论，是邓小平深刻观察战后历史条件变化得出来的理论结

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列宁在本世纪初制定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理论在战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

第二，这个新的时代论为解决战后各种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不注意研究战后新时代呈现出来的新特征，仍抱着陈旧的时代观不放，以致从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方面，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甚至与新时代背道而驰，这是战后时期苏联陷于衰落和停滞的时代根源。而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密切结合本国的实际，时刻研究战后新时代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中，紧紧追随战后新时代的步伐，时刻与时代同步，不断突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条条框框，则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20 年来取得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动力源泉。

第三，邓小平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结合当代实际，回答了社会主义在现时代实践中的迫切理论问题，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指明了在国际大变化的新格局下，中国如何抓住机遇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方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兴起，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传统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的一个现代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正在到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映了战后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

（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主义。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而发展生产力，不是一般地发展，而要依靠高科技来发展。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邓小

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①“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②

（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的新时代，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

（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外政策的社会主义。战后新时代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但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环境要有斗争，为了维护和平环境，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

第二类是苏联对外政策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着重论述了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以及苏联霸权主义的历史、思想理论和社会经济几个方面的根源。

第三类文章，主要是与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有关的文章。除一两篇苏联剧变后不久写的综合性分析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与历史原因的文章外，其他则或从苏联落后于战后新时代角度去分析苏联剧变的时代根源；或从一个侧面，如从苏联经济军事化去分析苏联剧变的经济根源；或从指导思想的错误去分析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探索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解体的原因和教训，这是个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大课题。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从事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现在这方面的成果已不少，在探讨苏联剧变或解体的原因和教训方面，已出现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正在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一些同志现在已不满足于一般综述苏联剧变原因，而是向探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的方向发展。我不揣浅陋，也愿把自己近两年有关苏联剧变深层原因问题的思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② 同上书，第90页。

考，作一简要介绍，供有志于探讨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参考。

关于苏联剧变深层次的原因，我的看法如下：

（一）苏联发生剧变，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总的原因为来说，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长期不进行改革，日趋僵化，日益同战后新时代要求相背离的结果。

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时期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在实行广泛国有化基础上，在政治、经济、理论文化思想各方面实行中央高度集权全面管制的备战型行政命令体制；从政治方面说，是中央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集权于党，集权于领袖个人；从经济方面说，在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全面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侧重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理论文化思想方面说，理论的发明和解释权高度集中，以党的最高领导的言论为马列主义的准绳，以行政手段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和舆论控制。

这个模式基本上适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要求。在战前苏联工业化建设中，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战后恢复中，曾经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战后一段时间内，苏联作为战胜国，成为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苏联支持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兴起，社会主义苏联的国际威望和影响曾经达到高峰；斯大林个人的威望和国内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顶峰。虽然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但这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极盛时期。

但从战后 40 年代后期起，到 50 年代初，斯大林执政时期最后几年，由于斯大林的骄傲自满，他不再研究战后的新变化，他把战前适应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模式绝对化，他把苏联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并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在他执政末期，不但不进行任何改革，而且反对任何改革。

个人崇拜极大发展，“左”的教条主义泛滥一时。苏联社会主义，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从思想理论到对外关系，各方面都走上了以“左”的理论和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僵化的道路。

这中间经历了赫鲁晓夫不成功的改革，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体制的修补和改良，总的说来，这个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和“左”的僵化理论和政策仍然继续保持下来。

在反法西斯世界大战胜利的影响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不断，欧亚两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新的胜利，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拥有了核武器，战后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西方国家为缓和国内矛盾实行经济调整和改进了对工人的社会福利政策，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强大的力量——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新的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在战后时期出现了。然而，苏联在战后时期长期延续下来的“左”的僵化理论和政策，同这个新时代的要求恰恰是背道而驰。新时代要求和平，僵化政策却是加紧备战和军备竞赛；新时代要求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僵化政策则继续侧重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新时代要求改革体制以适应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僵化政策则对新科技革命视而不见或议而不决，根本不进行体制改革；新时代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发展，僵化政策则坚持必须照搬传统模式，动辄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内政进行干涉；新时代要求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外开放，逐步过渡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僵化政策则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出发，仍坚持中央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外实行封闭政策；新时代要求同西方国家实行长期的和平共处政策，僵化政策则仍然奉行同西方的对抗政策，仍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 and 路线。由于“左”的僵化的理论和政策严重背离新时代的要求，严重脱离实际，不能不

陷入内外碰壁的困境。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随着这个僵化模式不适应时代要求的矛盾更为尖锐化，在政治、经济、理论和对外政策各方面的停滞和衰落都全面暴露出来。

政治方面的停滞和衰落，主要表现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领导层干部都严重老化，许多重大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政机构空前膨胀，办事拖拉，互相扯皮，空谈盛行，不干实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更为泛滥；行贿受贿之风和上下之间送礼之风盛行。各地方甚至设立专门的礼品仓库。领导干部贪污腐化，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的停滞和衰落，集中表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经济发展的停滞上。苏联 1976~1980 年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有 1%，1981~1985 年则降为 0.6%。

理论上的停滞和衰落，主要表现在“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严重落后于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实际，而又坚持不改。其中两大理论危害最大，一是超越历史阶段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二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论。这两大理论严重脱离苏联国内外实际，极大妨碍了苏联自己的改革与开放，而且这种理论同现实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苏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怀疑与动摇。

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僵化和失败，主要表现在，苏联这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作为欧洲人民的解放者受到世界崇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却逐步沦落为一个凭借武力肆意干涉他国、他党内政，并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搞军备对抗的霸权主义国家。出兵阿富汗，更使苏联陷于极端孤立。

苏联在政治、经济、理论和对外政策这几个方面由僵化发展为停滞和衰落的消极变化，经过几代领导，越来越严重。这种消极变化动摇了广大党员和群众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侵

蚀了这个超级大国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凝聚力，逐渐失去了人民群众对苏共、苏联政府的信任，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党的日益加深的危机，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乘虚而入，这就为苏联剧变准备了客观条件。

（二）为什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僵化的趋向在斯大林之后，经过几代领导人，还是得不到纠正？其根本原因在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已经形成一个拥有巨大权力而又不受监督的官僚特权阶层。

斯大林模式虽然可分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理论文化思想体制等几个方面，但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集权于党、集权于领袖个人的这种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这种情况，在苏联建国初期就已存在。列宁时期已出现党干预行政过多的情况。对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列宁确定了原则，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琐碎的干预”。但是由于国内战争环境，国家机关中有大量留用人员，干部缺乏，实际上党还是包揽了许多政务。如何在操作上解决党与苏维埃的关系，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但列宁已来不及去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执政后，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实践制度化了。斯大林虽然口头上也说党的领导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干部人事上的领导和监督检查，但又强调，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在联共（布）十八大报告中说：“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机关的指挥人员。”这些提法，实际上把党和国家混为一体，也成了党政不分的理论根据。在实践上，30年代以来，

苏联的州以上党委开始设立负责生产业务的部门，苏共中央设工业、农业、运输、计划、财政、贸易等与国家行政部门相应的部门。因此，可以说，把以党代政、党政合一制度化，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这是斯大林模式的特点之一。

赫鲁晓夫时期虽然进行了某些改革，但在个人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党政领导体制上，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到1962年11月全会，他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无比增长”，需要党“内行地、经常地和具体地”领导生产，全会作出了在州和边疆区建立平行的工业党、农业党组织的决定，以党代政的现象更为发展了。勃列日涅夫一上任就把工业党农业党合并，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实践没有什么改变。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共中央经济部门不断增加，最多达24个部，其中11个部与政府重复。1977年6月，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说：这是“党的领导作用不断增长的表现”，又说，“这反映了我们的日常实践。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都直接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最高层领导也搞党政合一，并认为是理所当然，个人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制度就更为定型化了。

这种个人高度集权、党政合一的制度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拥有巨大权力而不受任何监督的官僚特权阶层。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他们凌驾于党和国家政府与群众组织之上，不受任何监督。政府照例有个名义上的监督机构，如检察部门、各级苏维埃，但这个党政合一体制，是以党的名义出现的，政府、检察机关、苏维埃等机构并无权力去监督党的领导机构，相反，要受中央政治局和各级党委的领导。党的中央政治局成为超政府的、超苏维埃的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党虽然也有监督机构，但从斯大林时期起，就把监委变成同级党委的下属机构。政治局作出的任何决定，它都无法监督，而且越